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海外学子系列

刘东主编

TALES OF TRANSLATIONS

翻译的传说

中国新女性的形成 (1898—1918)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8—1918

胡缨 著
龙瑜成 译
彭姗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海外学子系列

刘东主编

TALES OF TRANSLATIONS

翻译的传说

中国新女性的形成 (1898-1918)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1898-1918



彭胡
龙藏
著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胡纛著;龙瑜成,彭姗姗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5666-5

I. 翻… II. 胡… III. 翻译—文学史—中国—近代

IV. I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3140 号

Tales of Translations: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8-1918

Copyright © 2000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 © 2009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098

书 名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

著 者 胡 纛

译 者 龙瑜成 彭姗姗

责任编辑 王 田

装帧设计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南门,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南门,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8.5 插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666-5

定 价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译者的话

初次知道胡纓教授，还是在《中国学术》的一次例会上，听闻她的一篇论文《九葬秋瑾》。其文不按古，匠心独运。取材之细致入微，于平凡中见新意，分析之丝丝入扣，必宛转以尽其义，处处显出女学者所独具的细腻敏锐，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些优点在她这本更早的著作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读者若能综览全书，当知此言不谬。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远非如其标题所显示那么清晰简明，其内容纷繁错综，引人深思。如同作者在“导言”中所坦承的，“新女性”是五四时期而非清末民初所流行的一个概念，因此，此书的关注点与其说是“新女性”，不如说是“新女性”的前史——晚清方生方成的文化如何为五四时期建构“新女性”提供了资源，其复杂血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想象。毫无疑问，各种西方话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翻译”为考查这一过程提供了极佳视角。然而，将“翻译”理解为关于“越界”的一个隐喻可能更为切题。通过对诸多细节的把玩，作者发现了清末民初这个“转型时期”的种种“越界”：民族的越界、文化的越界、性别的越界、语言的越界、文本的越界、文类的越界、语词的越界、服饰的越界、风格的越界、身份的越界。

道德规范的越界等等。而“新女性”的因子正是经由这多重“越界”才被激发出来,其间各种中、西话语与实践之间的纠缠、冲突、扭转、紧张、并进与和谐,远非中西语言间的“翻译”所能涵括。

第一章中作者对《孽海花》的解读可堪为例。作者抛开“社会谴责小说”这一通用的阐释范畴,反而聚焦于“叙事性想象开始脱离‘真实的’历史记录、似乎有些离题的地方”,即彩云的经历。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小妾彩云地位提升的关键:一系列的越界。最初的越界只是彩云借了正室诰服来穿,但同时,彩云便轻而易举地借取了大使夫人的头衔,跨越了双重界线:社会等级(从小妾到夫人,从底层到上层)、性别区分的界限(内室和跨洋)。之后,彩云在国外以茶花女一般的西式装扮完成了第二次越轨,跨越了文化的界限(中国传统对西方作派),从而摆脱了伴随着妻室权利而来的种种束缚。同时,从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那里学会的德语令彩云完成了语言的越界。借由语言能力这一文化资本,彩云多次令对外文一窍不通的丈夫陷于窘境。从而,语言的越界构成了一种隐蔽的性别越界,因为这反转了彩云与其丈夫之间的权力关系,后者本来拥有掌控彩云的一切权利。最后,作者还发现,彩云这个角色超越了三个所谓的“叙事主调”(master plot),即,《红楼梦》的浪漫故事、《金瓶梅》的“淫妇”形象以及对名妓的传统描述。这些叙述主调一再试图将彩云这一角色吸收进去,但往往在读者顺着惯例兴致勃勃地以为已经完全把握住彩云时,她又不经意地溜走了。于此,作者得出结论,正是叙述主调的失败,正是因为叙事主调解释不了彩云这个人物,证明了“无论多么让人怀疑,她都称得上是新女性的一位先驱”。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倒过来说可能更好: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能从彩云身上获得些什么的话,就在于彩云跨越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多重界线,冲破了现有的解释樊笼。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并不相信历史目的论,那么,我们只能说,彩云,这位谜一样的人物,这个曾朴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物,向着

不明的未来敞开。

读者对于作者的具体结论,当然可以各抒己见。这无损于此书的魅力。它那些耐人寻味的细节、精彩纷呈的文本细读为读者的多种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远非像表面上那么清晰,这是一部有着谜一般吸引力的著作,恰如晚清本身。介绍一本这样的著作,我想还是点到即止为妙。

此书由我和师妹共同翻译,在翻译期间,胡缨教授和蔼而耐心的帮助,令我们非常感激。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一再为我们宽限交稿时间,也深表谢意。学力所限,译文若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彭姗姗

2009年1月19日

鸣谢

在过去的十年中,尽管仍然无法抗拒文化比较的诱惑,我逐渐进行了知识转向,从一位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转到了中国文学和历史领域。而这本书正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它的前身是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时,在浦安迪(Andrew Plaks)、詹姆斯·布姆(James Boom)和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等几位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学位论文。特别是浦安迪教授,以身作则地向我示范了何谓学者。我感谢所有指导老师,他们给了我灵感、指导,尤其是慷慨我在一个自己当时还并不十分清楚的领域进行探索。虽然眼前的这本书与他们签字认可的那篇论文已经大不相同,但依然留下了他们教导的痕迹——如果引用此书所提及的一位中国作家的话,这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般”。我要特别向戴梅可(Michael Nylan)致谢,这位老师、同事以及忠实的朋友,从一开始就为我提供了不断的知识指导以及慷慨的精神支持。而这本书的起源,必须要归功于罗伯特·伯林(Robert Burlin)教授,正是他最先提议以“翻译”作为研究的主题。卡罗·伯恩斯坦(Carol Bernstein)、简·赫德利(Jane Hedley)以及刚刚故去的卡特瑞·伯林(Katrin Burlin)教授的培养,则让我对批评理论以及

女权运动萌发兴趣。高友工和孟而康(Earl Miner)教授将我引入了比较诗学的迷人世界。我还要感谢普利斯顿的朋友们,他们是:数年前,给了我第一份有关中国女权运动的参考书目的艾梅兰(Maram Epstein);启发了我的才智,并予以温暖友谊的尼克·卡尔(Nick Cull)、罗宾·科曼(Robin Kornman);以及凯瑟琳·菲斯班德(Catherine Fasbender)。

胡志德(Ted Hutters)教授率先向我全面地展示了晚清研究的复杂与激动人心,当时的我,正为耕耘这一边缘领域的前景感到沮丧。在我写作、思考与再思考的各个阶段里,凭借着堪为楷范的慷慨以及无尽的热情,他始终如一地为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反馈意见和鼓励。几年来,季家珍(Joan Judge)、孟悦和曾佩琳(Paola Zamperini)这些晚清领域的同仁们,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新的文献资料,极尽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唐小兵欣然回复了我关于梁启超的多番询问,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数次在我求助的电话中,就中国研究的技巧问题,给予我非常值得感激的提示,并让我与这个领域建立起了最有价值的联系。上海作家协会的魏绍昌先生与复旦大学的王继权教授给了我许多教诲。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多年来,他们慷慨地把他们的最新学术成果与我分享,夏教授言传身教,在晚清迷宫般的世界里,多次为我引路。我现在对晚清世界的些许了解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帮助。

许多老师,同事和朋友看了我的原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并对我的进一步阅读提出建议。尽管成稿也许并不那么符合他们的预期,但对他们的帮助,我无限感激。迈克·费伦(Michael Phelan)仔细地通读了整部原稿。在延长的修订时期,他对这一课题的热情投入不止一次地重新点燃了我自己的激情,他不断地询问“你是指什么”,这尽管经常让人恼怒,却总是能找到我理解中潜藏的断裂和思

考中的盲点。在全书的结构和内容方面,王德威(David Wang)和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给了我极具价值的建议。苏珊·克兰(Susan Klein)、高彦颐(Dorothy Ko)、季家珍、曼素恩(Susan Mann)、孟悦、戴梅可、罗丽莎(Lisa Rofel)、凯茜·拉格斯代尔(Kathy Ragsdale)、安妮·沃尔索尔(Anne Walthall)以及曾佩琳等人都阅读了原稿中的一些章节,他们的批评显然提高了本书的质量。这些年来,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以及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同事们与我分享了他们精深的专业知识,并极为耐心地回答了我的许多疑问。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将要贫乏许多,我本人亦然。这些优秀的同事包括:南茜·艾伯曼(Nancy Abelmann)、切丽·贝利(Cherrie Baily)、蔡宗齐、斯蒂芬·卡特(Steven Carter)、陈幼石、庄爱玲(Eileen Cheng)、马克·艾略特(Mark Elliott)、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傅君励(Michael Fuller)、贺萧(Gail Hershatter)、黄卫总(Martin Huang)、傅佛果(Joshua Fogel)、李湛忞(Benjamin Lee)、李胜生(Peter Li)、李耀宗、李惠仪、里耶(John Lie)、林培瑞(Perry Link)、米华健(James Millward)、韩书瑞(Susan Naquin)、彭慕兰(Ken Pomanranz)、唐·普莱斯(Don Price)、苏堂棣(Donald Sutton)、汪晖以及吴毓山。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项目(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ublications Program)的约翰·齐默(John Ziemer),为了此书的完成,他所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了其原有职责。我也要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约翰·芬尼罗(John Feneron)致谢,从初稿到最终脱稿,他都做了许多工作。他辛苦地审阅了全稿,进行了大量的文体整理,总体上使之成为了一部更具可读性的著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父母,胡文仲和吴祯福,此书正是献给他们的。身处千里之外,他们却始终紧密分享着我的写作体验,并总在恰当的时候寄来恰当的书籍。确实,从我拥有自己的第一本书开

始,我的父母便一直引导着我的阅读和写作,给我指出正确的方向,让我得以避开许多陷阱;但同时他们也给我足够的自由,任我求索自己的道路。

我要感谢档案总会(the General Commission on Archives),联合卫理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以及密歇根大学的本特利历史图书馆(the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它们为我提供了有关康爱德的档案材料。我还要向其他很多机构致谢。伊利诺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课程免除为我校订书稿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为我的中国研究之行提供了旅费补助。针对年轻教员学术发展颁发的一些奖项,以及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研究委员会的奖助为我的旅行和研究提供了亟需的资金。

胡 缨

1999年于尔湾

目 录

译者的话 1

鸣 谢 1

导 言 浮现中的新女性及其重要的他者 1

第一章 《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 26

第二章 移植“茶花女” 79

第三章 从索菲亚到苏菲亚 125

第四章 罗兰夫人及其中国姐妹 172

结 语 216

参考文献 221

索 引 246

导言 浮现中的新女性及其重要的他者

(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并通过“意义”来隐藏这一外来者的异他性(alterity)，或者，等而言之，它意在安抚那些依然萦绕于现在的死者，并将他们送入经典的坟墓。

——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e de Certeau)

1876年冬，中国第一个外交代表团告别清帝，扬帆驶往英国。与大使随从同行的刘锡鸿，是朝廷保守派派出的一位特使，其职责在于抑制大使郭嵩焘效法西洋的倾向。刘锡鸿对自己的政治使命十分忠心，在旅行日记中历数了那个中国文化视野之外的世界的各种异行：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家事皆妻倡夫随，坐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时，夫事其妻如中国孝子之事父母，否则众訾之)，论生育则重女轻男，……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①

^① 《英轺私记》，1877年9月4日。收录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1:48, Frodsham, J. D. 译，1974:148—149页。作者对译文做了一定修改(此中译本引文均出自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下文不再另行标识。——译者注)。

离奇的游记传说多半未必只是简单误传(misrepresentation)。在晚清,外交官需要完成大量旅行日记,并按月将其送返,供官方研读。^① 和此处的情况相同,对中外差异的夸大往往是有意的,好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加药添弹。想而可知,刘锡鸿的修辞是颠倒性的,他对英国形象的描绘,是投合朝中那些预期读者的对跖性预期的。当他描述这些根本性的文化差异时,英国政治机体的“颠而倒之”,几乎是很随意地、仿佛逻辑自明般地被调换为一种关于“女性地位”设置的明显差异。

而刘锡鸿所说的“地轴”似乎被他同时代的杨·J·艾伦(Young J. Allen, 1836—1907)给翻转了过来。后者力图证明西方的“女性地位”显示了一种关于“正确”的宇宙秩序的、截然不同的见解。更多地以其中文名字“林乐知”为同代人熟知,艾伦是19世纪下半叶,最为积极的美国在华传教士之一,他积极主张政治改革、尤其是吁求中国女性的“平等权利”,在当时颇有影响力。^② 事实上,“女性地位”是艾伦用来衡量一种文化之世界地位的标准所在。在他编辑的十卷本《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序言中,艾伦解释道:

本书则以各国女人之地位,与其看待女人之法,为比较教化优劣之定格。此即《女俗通考》之名所由取,亦即可称为万国古今教化之论衡。又即可使读是书者,得以自证中国教化所至之真地位也。^③

通过关于“未教化人”(非洲人)、“有教化人”(埃及人和小亚细亚人)以及“文明教化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的三层论述,艾伦宣称:“凡国不先将女

① Arkush and Lee, 1989: 17.

② 除了是位多产的作家和译者外,杨·J·艾伦也是月刊《万国公报》(1889—1907)的总编辑。这一月刊致力于报道时事,在当时广为中国改革者阅读。有关传教事业及其对晚清改革者的影响,可以参看 Cohen, 1978: 579—80。

③ 林乐知(Young J. Allen):《《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4年8月29日。NQYDSL: 824。

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者,绝不能有振兴之盼望。”^①和刘锡鸿旅行日记的情况一样,女性形象在此再次成为了构建“差异性”的平台所在;不同的是,这里的女性地位变成了一种转喻符号,为殖民主义者的“教化使命”提供了重要根据。以西方为文化参照系,艾伦用典型的殖民主义话语声称自己“尤不能一日去诸怀者,则惟此振兴女学,释放女人,以提拔女人平等之地位”,这种论调在当时并不少见。他在中国的工作也必然成为全球政治图景中的一部分。在其他地方,如费城,就有另一位编辑编了一部类似的著作回应艾伦的论点:“女性在任一国家具有的相对地位便是该国文化的索引,以此审度东方,会发现有许多阶段尚待完成。”^②

虽然艾伦的殖民主义腔调无疑会在其中国读者中激起矛盾的心理,但他的基本设想却未受质疑。事实上,和艾伦将“教化优劣”与“女人之地位”联系起来一样,改革派领袖梁启超(1873—1929)也认为“国力”与“女学”相关:“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③不止一次,梁启超借助于女性形象作为其“新民”这一民族主义计划的激发器。^④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女性地位”并不是自然或文化差异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之系统性问题的一大症状。

1897年,梁启超发表了《记江西康女士》,是一篇关于“中国第一位女医生”康爱德(1873—1930)的传记。康爱德被一位女传教士收养,并在

① 这是对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著名论断的典型应用,他指出女性的解放是一个时代之普遍解放的索引。而为了适用于殖民事业,“时代”在此变成了“文明”。对这一观点的批评,可以参看 Kelley, 1984。

② 《各个时代与国家的女性》(*Woman: in All Ages and in All Countries*), 1907, 4: vii。

③ 梁启超, 1936a, 1: 37;《论女学》。关于梁启超对传教士出版物之矛盾态度的详细讨论,可以参看 Chen, Chi-yun, 1962: 166—125。

④ 梁启超的这一用语来自于经典《大学》。而对《大学》中的这一用语,可从语义角度作两种解释:“爱民”和“革新民众”。梁启超(1936b, 3: 1,《新民说》)是这样界定他对该词的使用的:“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梁启超同时将此词作为复合名词和及物动词使用。有关梁启超这一概念的讨论,可以参看 Chang, Hao, 1971: 149—219; Huang, Philip C., 1972: 64—67;以及 Tang, Xiaobing, 1996: 16—26。

美国接受了教育。当时,她刚回到中国,并开办了一所医院。梁启超强调她自幼父母双亡的经历可以说是一种因祸得福的好运,并指出美国人对女性及其教育的极度重视:

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无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Gertrude Howe——译者注),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与常女无以异。^①

康爱德故事的力量在于它的代表性功效:梁启超感兴趣的,并不是某一个体,而是中国女性之全体,同时,他也在暗指潜在的全体中国公民。在梁启超看来,康爱德与“两万万”中国女性的唯一区别,在于她是在美国依循着一套不同的价值体系长大的。出于对文化本质主义的反对,梁启超并不只是想以标准的美国现代女性简单地取代标准的中国传统女性。事实上,这种对比是受政治动机驱动的。毕竟,梁启超写这篇传记的意图在于将女性教育问题与民族改良议程勾连在一起,而他的名字一直是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

重塑女性

与我们这个时代有些相似,晚清也许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与异质文化频繁接触(而且互相对抗)的时代。19世纪期间,西方不再像刘锡鸿所说的那样“居于地轴下”,而是凭借其“教化使命”使得中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感觉到它的存在。这是一个转型时期,国家、种族以及国家和种族的身份都处于转型之中。与当代一样,晚清的文化产品既回应了这一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建构了它。

尽管刘锡鸿这样的保守派与梁启超代表的改革派在政治立场方面相

^① 梁启超,1936a, 1:120。